

· 506160

1994

中国小说年鉴



少数民族小说卷

SHAO SHU MIN ZU

XIAO SHUO JUAN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4中国小说年鉴·少数民族小说卷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外小庄北里二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法库印刷厂印刷

字数：400,000 开本：787 × 1092 $\frac{1}{32}$ 印张：18.6 插页：4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9,000 册

特约编辑：吴重阳 度修明 封面设计：李正明

统一书号：10363 · 011

定价：3.15元

《1984中国小说年鉴》序

孔 凡 青

1984年，中国小说在不平静的文学航道上继续前行，留下一串串激扬飞越、五光十色的浪花。我们捧起一束奉献给读者，集成《1984中国小说年鉴》。

这是一套十卷本、三百五十余万字的编年体小说总集。它多角度、多层次地选录了1984年中国文坛（从大陆到台港）涌现出的有代表性的小说。我们分成十卷，绝无十全十美之意，只希望能反映出这一年小说发展的多样化趋势。多样化，也许正是这个小说丰收年的一个特殊标记，这是令人鼓舞的好兆头。多样化是一切快感的源泉，小说向多极、多元化发展，无疑是政治清明、经济文化腾飞的时代，人民群众千差万别的审美情趣得到初步满足的表现，是小说走向黄金时期的开端。

这一年小说作品浩如烟海，编选是个苦差事，也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尊重文学对生活那“富有诗意的裁判”的权威，也承认文学那“寓教于乐”给人以美的愉悦的

作用。所以，凡能给人以某些思想启迪或健康的美感享受的作品，我们都给予应有的礼遇。

这套小说年鉴的编选工作，得到现代著名老作家沈从文、严文井的热情指导和殷切关注，他们又担任了小说年鉴顾问，这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十几位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评论家、编辑，参加了编选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还有值得说明的，这套书中，不少卷的序言，都出自近年来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之手，读者自会感受到那股年轻人的朝气。

编辑这类大型的小说年鉴，我们自知才力不逮、经验不足。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叫“小说研究会”的组织出版过一部小说年鉴，不很成功，这次，也许又是自讨苦吃。但这是一项事业，总要去尝试，总要去奋力开拓！

我们诚恳地期望海内外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这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1984中国小说年鉴 少数民族小说卷序》

周政保

这的确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作品是由少数民族作者写的，写的又大都是少数民族的生活。作为一个小说的领域，这些作品所诉诸读者的社会生活画面与思想感情信息，以及全部抒写所赖以存在的传统的或现代的文化背景，是汉族小说所无法替代的。或者说，这些作品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形态与审美价值，铸造、并稳定了自己在当代小说界的地位。假如我们以更长远、更广阔、乃至多元的视野来审察，那就不难发现，这些小说不仅富有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存留意义，而且具备着多姿多彩的恩情启迪性与比较恒定的艺术生命力。

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伴随着一大批好作品的问世，少数民族的小说创作队伍，正在不断获得新鲜的血液——他们日益显得成熟和富有创造性。张承志（回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江浩（满族）、李传锋（土家族）、景宜（白族）、扎西达娃（藏族）、岑献青（壮族）、白雪林（蒙古族）……他们以自己的——那种融合着当代色彩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神奇的艺

术才华，各各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世界。老实说，这是一支富有实力的，因而也是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中国当代小说界由于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加完整与更加充满民族性。民族性不是一个单一的虚幻的概念，它是从各个民族的文化土壤与思维世界中产生的——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性，正是经由各民族作家的审美历程及具体创作实践，而获得那种综合意义上的实现的。

我们读少数民族的小说，可以截获、收录与彻悟到许多富有审美价值及特殊认识意义的新鲜信息，而这些充满了异样感的信息，恰恰是我们在感受汉族作家（哪怕是成绩卓著的汉族作家）的作品时，常常容易受那种司空见惯的习性的阻挠而被忽视或模糊了的，如创作历程中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民族心理素质与思维方式的制约、真正的民族特色的产生，以及时代思潮与稳态的民族生活的磨擦效应、地域风习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作用，等等。

就整体而言，现今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所面对的现实对象，大都是处于比较偏僻的、相对稳定与古老之中的传统生活，但世界的新潮流与时代的新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对这种生活产生强大的感应与剧烈的冲击；那种历史悠久的民族生活，也自然而然地会与新的生活力量产生碰撞与冲突，从而迸溅出最富有社会意义的变革性的火花。马治中（回族）的《“方”迷新传》、王安（满族）的《克里亚兵站》、孙健忠（土家族）的《云里，雾里》、吾拉孜汗·阿合麦德（哈萨克族）的《拉赫木拜》、姚金海（回族）的《西街小镇》……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思情、所包笼的内核，正是从变化着的民族生活中打捞与提炼出来的。小说的作者分别从不同的

侧面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传达了崭新的时代消息——那个远近闻名的“方”迷马六十老汉，突然心血来潮要举办家庭下“方”邀请赛，他的心理变化的驱动力是什么呢？那个生活在最荒凉的锦鸡岭的蝉妹，是那样向往云雾之外的龙尾街，这仅仅是一种爱的萌发与情的冲动吗？那个笃信干一切活“全都是白费劲”的拉赫木拜，难道是真主给了他这番品性吗？如果不是，那他的精神生活与客观外界究竟有些怎样的联系？还有那个“西街小镇”，原来是多么古老、恒静，可现在冒出了这么多的苦恼与矛盾，在“凉面匠人”马四老汉的那双混浊的眼中，世态竟是变得这样突兀离奇与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仔细地审视这些作品，那是不难感受到其中的奥秘的。而这种奥秘的价值，就在于作品以微观的色泽，鲜亮清晰地折射出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光芒。诚然，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画面，既不是蒋子龙式的，也不是陈冲式的，而是古朴与呈恒稳感的，其变化虽然不乏急剧性，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缓慢与渐进的，以至于具有极大的滞留性。然而，这种独特的生活质地与推进态势，并不会减弱时代光芒的强度与穿透性；相反，人们正是从这样一种厚实丰富的传统生活层次中，才窥见了当代生活思潮的巨大历史力量。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顽强而充满了生命般的延续性的。它既具有优秀的进取的一面，又具有落后的保守的一面；而后者的那种惰性，往往是造成一个民族落伍的内在阻力。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不是凝固的、孤立的与封闭的，特别是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开放与发展，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民族生活与时代变迁的互相作用，将越来越

显得频繁与迅速。可以相信，若干年后的我国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所可能产生的变化，一定会使墨守陈规的民族学家感到惊愕迷茫。而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少数民族小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这种微妙深刻的动荡与变化，特别是这些作品，分别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独到方式，预言性地凸现了这种动荡与变化的方向，以及其中所包孕的、可以认为是体现了整个人类进程的规律性——这是少数民族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美学价值。

民族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性格素质的、思维方式的、心理习惯的、宗教信仰的、风俗民情的，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溢着本民族文化积淀的独特性。而每一个民族作家的具体创作，也无一例外地会留下这种独特性的烙印——张承志与乌热尔图不一样，艾克拜尔·米吉提与李传锋不一样，江浩与岑献青不一样，景宜与扎西达娃也不一样……小说的民族特色，主要受制于作家的思情特质的民族性因素。当然，依据别林斯基古老的说法，只要描写是真实的，作品就必然是充满了民族性的。但无论如何，作品的这种民族特色的实现，必须经由作家的包括思维与心理在内的个性过程的筛选。我们可以把民族特色分为两种形态：一是表层的外在形态，一是深层的意蕴形态。前者比较容易达到，后者却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内涵——那是包笼或潜藏在作品的整体描写之中的、並起着统辖作用的民族性思情意识，它的表现方式往往是曲折的、隐含的、渗透性的，因而也时常被人忽略。但凭着审美的直觉，却可以感悟到这种内在意蕴的存在。不言而喻，这种民族性的意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物个性的刻画而获得凸现。

的。所以，无论是表层的外在形态，还是深层的意蕴形态，两者是难以离异的，至少在一部优秀的作品中是如此。它们总是互相叠合与交融在一个整体中，谁也不能舍弃谁，就象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而时代感，就是在这种表层与深层的民族特色的统一中升腾起来中：恰如最富有当代性的作者同样也离不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样，创作的历程更离不开时代主潮的熏陶与冲击，新的思想与新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在真实的、民族生活的描写中呈显出来，更何况民族生活本身已经灌满了当代性的风与雨。乌热尔图的《越过克波河》所展现，是一幅幅地地道道的“风俗画”，但作品中的意念贯穿与人物刻画，不仅是富有民族风味的，而且是充满了浓郁的、属于新旧交替时期的生活气息，尤其是作者所创造的三个人物形象——蒙克、卡布坎、波拉，全然是一种当代社会思潮的反射，一种变革时代的道德观念与习俗方式的严肃探讨。而艾克拜尔·米吉提的《金色的秋叶》（在《萌芽》1984年第5期发表时题为《阿尔曼和玛格萨蒂》）所描写的山区生活的民族色彩，也是鲜明而富厚的，但在作品的全部抒写中，却浸透着一种新的生活意识及观念形态的觉醒与呈示，那不仅仅是人物的向往，也是作者的追求——作品中的主人公阿尔曼，是那样钟情于美的现实、美的创造与美的理想世界，这难道不是一种洋溢着时代感的民族心理变化的艺术体现么？显然，这种渗透与隐含于民族特色之中的时代感的表现形态，是深沉而富有艺术魅力的。假如整个中国的小说创作，都能唤起这种审美的自觉性，那就可能更有利于以充分的民族性气质与深刻的当代性色彩征服异域世界的读者。

我们看到，一些力图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汉族作者，也许是出于语言障碍或生活隔膜的致命原因，多多少少带有某种描写的表面性（甚至是肤浅的猎奇性）。但这些少数民族的小说，却真正摆脱了那种令人感到悲哀的文学现象。他们作为本民族或近亲民族的成员（大部分是如此，只有少数是例外，如张承志的一些作品是写蒙古族草原生活的，但他通晓蒙古史、蒙古语与当代蒙古族生活），并不是为写民族生活而写民族生活——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创作冲动，他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确是从自己生存的那块生活土壤上爆发与蒸腾起来的。他们是那样真诚，那样严肃，那样自然而然地观察、体验、开掘、概括着自己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他们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探求，有着自己的艺术考虑与美学理想；他们的创造能力，并不低于整个中国的文学水准线，尽管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缺少小说创作的传统。他们善于吸收与开拓，而且较少小说创作的保守性及现成思路。他们中间的不少作家，象苏联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那样，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学创作水平——如张承志、乌热尔图。张承志在一九八四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北方的河》，而这部小说所显示的思想艺术追求，不能不认为是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小说创作的新势头与新潮流。

从这些少数民族作者的一系列近作可以见出，他们大都十分注重人的内心世界及精神层次的描写与展现，而且并不躲避人性、人情的揭示与刻画。如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岑献青的《浮桥》、王家男（满族）的《猎人与妻子》、景宜的《岸上的秋天》、阿里木（维吾尔族）的《尼牙孜老婆婆》、洛松旺堆（藏族）的《花活佛》……都以丰

富多彩的社会人性、人情内容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且写得真切动人，颇能引起读者的心灵共振。但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小说并不以表现人性、人情作为文学描写的直接目标；人性、人情的描写，只是为了传达作者的生活思考——描写对象仅仅为某种恩情的寄托，提供了一种无限的、但又是充满目的性的形象材料。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严肃的态度，不仅讴歌了凡俗世界中的美好心灵与纯真感情，而且探索着人生哲理与道德观念，以及那种体现了人类前途的伟大生活力量。把人性、人情的描写与社会的、历史的、人生的、哲学的、道德的思索结合起来，几乎构成了相当一部分新涌现的少数民族小说的意蕴特色；而这种意蕴特色，又是从比较亘古与呈稳态的民族生活土壤上滋生的，因而就显得格外质朴与诚挚。这种文学现象的呈显，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整个时代的求索精神息息相通的；或者说，它是一种历史变革气息的恩情转现。尽管某些作品的社会背景具有淡化的倾向，但其中的追求及所灌注的心绪形态，却可以使人感受到某种与时代崇尚相适应的新思想与新观念。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人性、人情描写中，到处升腾着人生的进取感与拼搏意识，以及那种对于非真、非善、非美（还不一定是假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抨击与批判。江浩的《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描写了一个叫人颤抖的严寒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善，也有恶；有人性、有人情的凝集与升华，也有人性、人情的沉沦与反省；有残酷的纷争，也有人道主义的救助，但在充满了民族生活色彩的现实描写与氛围构筑中，却贯流着一种严峻而又正直善良的人格力量，一种使卑微者感到渺小、使低贱者感到可怜的崇高气度，一种与我们这个人类

世界的动荡相一致的精神信息流……

这些作者摒弃了简单化的模式，挣脱了那种“直奔主题”的惯性，自觉地寻求着寓意的多层性、丰富性与广阔性。不难发现，整体的、局部的、或者贯穿性的象征方式，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强化。随着小说观念的变化，他们不再为情节而情节、为故事而故事，而是力图把故事情节作为一种寓意的依托，以期在某种写实性的有限描写中，表现出更深刻、更广远、更久恒的思情。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写了“河”，精彩地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品格与气魄；李传锋在《牧鸡奴》中写了“狗”，机智地象征了一种生活的发现与思考；江浩在《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中写了“狼”，含蓄地传达了一个沉沦领域的没落与残酷；而边玲玲（满族）在《丹顶鹤》中写了“鹤”，显然也是一种曲折的象征，一种情感或意念的外化形态……这些执意追求“弦外之音”的写法，无一例外地丰厚了作品的容括量与总体性思索气息，而且为读者留下了宽阔的想象及回味的余地。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不少作者十分重视小说的调子及氛围的整一性与艺术把握——且不说《北方的河》、《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越过克波河》、《金色的秋叶》、《云里、雾里》、《蓝幽幽的峡谷》、《浮桥》、《岸上的秋天》这样的小说，就是哈萨克族女作者叶尔克西·库尔班别科娃的处女作《额尔齐斯河小调》，也极为强烈地凸现着这方面的特色。《额尔齐斯河小调》的全部抒写，真正地被沉浸在一种与表现内容相吻合的“小调”式的氛围之中，调子轻松、沉郁、坚毅、带一点儿淡淡的惆怅与悲凉，充满了迷人的艺术感染力。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调子与

氛围的把握，特别是要达到氛围与内容、调子与寓意的和谐统一，难度是很大的，以致于有的作家把这一境界的实现当作自己的终生追求的艺术目标。诚然，这一艺术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作者具有出色的审美感受力，而且需要相当娴熟的概括才能与驾驭本领，更需要一种把全部身心扑在描写对象上的恳切与真诚——这是前提，离开了这一前提，只会留下虚伪与造作，根本谈不上艺术的调子与氛围，更谈不上以此拨动读者的心弦了。假如张承志在写作《北方的河》、乌热尔图在写作《越过克波河》的时候，缺乏一种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切感受，缺乏一种真诚的、不吐不快的艺术心绪，那是无法把现有的这种调子贯穿到底的，也无法构筑起现有的这种整一性的氛围的。这里所谈的抒写真诚性问题，不仅构成了这些少数民族小说的美学品格，而且也揭示了这些作者的艺术态度——这种态度是当今的小说界应该获得加强的。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国家就应有多民族的文学。而民族文学的繁荣，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繁荣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况且民族文学的繁荣，还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作为小说，当然首先是它的审美价值，但作为少数民族小说，除了一般的审美价值之外，还有它的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独特的认识价值。当今天的或昨天的民族生活真正成为历史，而后人们在研究我们这个世纪、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情状的时候，这些小说将成为多么宝贵、多么丰富的形象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小说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宝库中的一笔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而现在，我

们应该更自觉地扶植与支持这种财富的创造。

1985年2月 天山北麓

目 录

《1984中国小说年鉴》序…………… 孔凡青 (1)

这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1984中国小说年鉴》(少数民族小说卷) 序

…………… 周政保 (3)

北方的河……………〔回族〕 张承志 (1)

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满族〕 江 浩 (108)

金翅大鹏……………〔纳西族〕 戈阿干 (147)

“方”迷新传……………〔回族〕 马治中 (195)

女帮办……………〔满族〕 赵大年 (216)

云里，雾里……………〔土家族〕 孙健忠 (232)

挫折……………〔侗族〕 袁仁琮 (260)

拉赫木拜……………〔哈萨克族〕 吾拉孜汗·阿合麦德 (276)

西街小镇……………〔回族〕 姚金海 (299)

克里亚兵站……………〔满族〕 王 安 (312)

丹顶鹤的故事……………〔满族〕 边玲玲 (329)

夜空，也有两只眼睛……………〔东乡族〕 舍·尤素夫 (343)

越河克波河……………〔鄂温克族〕 乌热尔图 (358)

- 金色的秋叶……………〔哈萨克族〕艾克拜尔·米吉提 (375)
- 牧鸡奴……………〔土家族〕李锋传 (395)
- 猎狗狮毛的故事
- 蓝幽幽的峡谷……………〔蒙古族〕白雪林 (415)
- 浮桥……………〔壮族〕岑献青 (427)
- 额尔齐斯河小调
- …〔哈萨克族〕叶尔克西·库尔班别科娃 (440)
- 猎人与妻子……………〔满族〕王家男 (451)
- 爱，溢满了红河谷……………〔哈尼族〕艾扎 (464)
- 想不到的事情……………〔藏族〕意西泽仁 (484)
- 岸上的秋天……………〔白族〕景宜 (495)
- 在河滩……………〔藏族〕扎西达娃 (510)
- 尼牙孜罕老婆婆……………〔维吾尔族〕阿里木 (520)
- 夕阳……………〔回族〕查舜 (529)
- 远方，水的传说……………〔仫佬族〕海涛 (545)
- 假鹿……………〔达斡尔族〕哈斯巴图尔 (559)
- 山寨，苦甜苦甜……………〔彝族〕普飞 (565)
- 花活佛……………〔藏族〕洛松旺堆 (572)